

溯源·解析·应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深度研究

王蓉月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

[摘要]本文围绕“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展开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梳理其发展脉络、剖析内涵、探讨战略价值及现代应用。该理念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变革期,在《孙子兵法》正式形成,在世界军事历史中有所呼应与演变。其内涵是“不战”与“屈人之兵”相辅相成,“不战”指优先用非武力手段,武力为辅助;“屈人之兵”旨在打击对手战斗意志,迫使其调整战略。战略价值体现在军事上降低成本、增强主动性;政治外交上契合时代趋势、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多边机制发展;经济社会方面节省资源、保障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为解决国际冲突提供新思路,对国家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意义深远。

[关键词]“不战而屈人之兵”;历史溯源;内涵解析;战略价值

[作者简介]王蓉月(2000—),女,山东临沂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2015>

[中图分类号] E8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成员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冲突与合作呈现出复杂交织的态势。“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源自古代的理念,历经漫长的历史演进,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格局中仍具有显著的价值,对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聚焦于该理念,旨在通过系统的历史溯源梳理其发展脉络,深入解析其内涵以精准把握核心要义,并从多个维度剖析其战略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其重要性。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通过全面梳理古今中外相关文献,归纳和总结理论观点与实践案例;同时运用案例分析法,借助典型事例论证该理念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及其价值,以此增强研究的说服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即通过运用心理战、外交举措、经济制裁等非武力手段,在心理和战略层面迫使对手屈服,进而达成战略目标的一种策略,该理念广泛渗透于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国际秩序的构建均具有深远影响。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历史溯源

(一)中国古代思想起源

“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发端于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革与思想繁荣的特殊时期。彼时,西周分封制渐趋瓦解,诸侯纷争不断,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引发人们对战争意义的深刻反思,促使社会各界迫切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有效路径。在此背景下,周礼

的式微与百家争鸣局面的兴起,为该理念的萌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滋养。

周礼作为西周时期的重要制度规范,高度重视礼仪、道德与秩序,始终倡导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冲突。正如张帆(2020)所指出的,周礼对战争礼仪规范有详细规定,从出师的名义到战场行为准则等方面,均体现出对和平解决冲突的追求,这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周礼规定战争需师出有名,严禁随意征伐,这种对战争正义性与和平性的强调,成为该理念产生的思想先导。

与此同时,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多思想流派针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进一步丰富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思想内涵。儒家秉持“仁政”思想,主张统治者以仁爱治国,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张立文(2021)认为,儒家倡导的推行仁政、提升国家道德影响力,能使他国心悦诚服,这与“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非武力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理念高度契合。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过度战争违背自然规律,不利于社会稳定。李泽厚(2019)指出,道家的这一观念促使人们思考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途径,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提供了侧面支持。墨家秉持“兼爱非攻”的思想,坚决反对战争,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互助互利,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孙中原(2019)指出,

墨家的这一思想直接体现了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对和平的追求一脉相承。

这些思想流派的观点,不仅真切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对和平的殷切期盼,更为后世的军事与政治理念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一论述标志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正式形成。孙子深刻认识到战争仅仅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以武力方式达成目标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和平的执着追求。这种理念不仅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璀璨瑰宝,更为后世的国际关系与军事战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源泉,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世界军事历史中的呼应与演变

“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并非仅存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在世界军事历史长河中也有着广泛的呼应与演变。古代西方,古希腊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雅典运用外交手段和心理战,试图削弱斯巴达的战斗意志,这种策略与中国古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有相似之处。然而,托马斯·霍布斯(1991)表明西方的这种实践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权谋,而非像中国古代那样从哲学和伦理的高度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种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战争观念上的本质区别,但也表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具有跨越文化和时空的普遍价值。

随着历史的演进,近现代国际关系变得复杂多变,军事技术也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并未被历史尘封,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传承和演变。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和平解决冲突的积极追求,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威慑机制,“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在这一时期未能充分付诸实践。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章》的通过,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制度保障,这可以视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层面的重要体现。冷战时期,美苏通过核威慑、心理战等方式避免直接军事冲突,这不仅是现代军事战略的重要应用,也从侧面反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深远影响。

综合以上论述,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始终深刻影响着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展现出独特的价值。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内涵解析

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理念中,“不战”作为手段,“屈人之兵”作为目的,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不战”并非完全摒弃武力,而是强调优先运用非武力手段,以营造战略优势,进而为实现“屈人之兵”创造有利条件;而“屈人之兵”则是“不战”策略实施后所期望达成的目标,即通过在心理和战略层面施加压力,迫使对手屈服。

(一)“不战”的手段

“不战”理念着重突出优先运用外交、经济制裁、心理战、舆论引导等非武力手段来达成战略意图。汉斯·摩根索(2005)认为这不仅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以及“威慑理论”相契合,同时也与新自由主义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相互呼应。权力的运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能够有效降低战争成本,通过心理威慑与战略布局,使对手在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屈服。例如,冷战时期,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借助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文化输出以及心理战等手段,逐步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最终促使苏联解体,这一实例充分彰显了非武力手段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必要情况下,武力可作为辅助手段,但对其使用规模和强度应进行严格把控。这与军事战略中的“效能原则”相契合,体现了对战争成本和风险的理性考量,与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行动服务于政治目标”这一观点高度一致。以海湾战争为例,美军凭借精确打击和空中优势,迅速摧毁伊拉克的军事指挥系统,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成功避免了大规模地面战争,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以及战争长期化所带来的风险,切实践行了最小化直接武力使用的理念。

(二)“屈人之兵”的目的

“屈人之兵”的核心要点在于通过威慑、心理战等方式打击对手的战斗意志。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展示,更依赖于对人类心理和行为决策机制的深刻理解。汉斯·摩根索(2005)指出恐惧和不确定性是影响决策者心理的重要因素。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75)在《远征欧陆》一书中提到二战期间,盟军通过广播、传单等形式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向德军传递战争即将结束的信号,制造恐惧和不确定性,从而动摇德军的士气,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战略层面,“屈人之兵”表现为迫使对手调整军事部署、放弃对抗意图。这与李德·哈特(1997)

阐释的“间接路线战略”相契合,即通过采取间接手段攻击敌人的弱点,并配合心理战、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措施,使对手在战略上陷入困境。19世纪普鲁士的“施里芬计划”,凭借快速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布局对法国形成威慑,尽管该计划最终未完全成功,但充分体现了促使对手在战略与行动层面屈服的思想,对后世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战略价值分析

(一)军事维度的价值

在传统全面战争模式下,其破坏力犹如一场巨大风暴,常造成难以估量的人员伤亡与资源损耗。回顾人类战争史,诸多实例表明,全面战争的创伤不仅即时显现,更在战后长期制约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与之截然不同,“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另辟蹊径,以非武力手段显著降低战争成本。该理念核心在于以最小代价达成战略目标,避免陷入残酷战争泥潭。

以海湾战争为例,美军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的运用堪称精妙。美军借助精确打击技术,精准打击敌方关键目标,在最大限度减少对无辜民众和非军事设施破坏的同时,降低自身部队伤亡风险。心理战的运用成为战争胜利的有力助推器,通过宣传和威慑等手段,从心理层面瓦解伊拉克军队战斗意志,迫使其在巨大压力下选择撤军。这种以极小人员伤亡迫使敌方撤军的策略,不仅规避了战争长期化带来的风险,如人员持续伤亡、资源过度消耗和国际舆论压力增大,还极大提升了军事行动效益。从军事战略角度剖析,此过程充分体现《孙子兵法》中“伐谋”与“伐交”思想。“伐谋”强调以智谋和战略规划战胜敌人,“伐交”注重利用外交手段分化敌人、争取盟友。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行动,巧妙融合两者,以最小军事力量投入获取最大战略成果。

此外,“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还体现在通过灵活运用非武力手段提前布局,打乱敌方节奏,增强战略主动性。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中,掌控节奏至关重要。例如冷战时期,北约通过核威慑和心理战等非武力手段,成功遏制苏联军事扩张。核威慑作为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使苏联在军事行动上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心理战从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等方面对苏联进行渗透和干扰,打乱其军事部署和战略规划节奏。北约通过提前布局,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有效保障成员国安全与稳定。这种战略主动性的获取,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彰显,更是战略智慧和理念运用

的成功范例。

(二)政治与外交维度的价值

从政治和外交层面深入探究,“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意义重大。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政治和外交手段在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该理念倡导以和平与智慧方式解决冲突,与现代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主流趋势高度契合。

以和平与智慧方式解决冲突,对提升国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作用非凡。善于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国家,往往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与赞誉。朝鲜战争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充分体现中国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坚定信念与积极倡导。中国通过践行这些原则,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众多国家看到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秉持公正、和平态度,愿意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外交关系。这不仅为中国外交活动营造良好环境,还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合作项目推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功不可没。

“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为外交斡旋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并推动多边和平解决机制发展。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各国利益诉求复杂多样,冲突矛盾难以避免。然而,通过外交斡旋,以和平谈判和协商等方式解决问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该理念强调在外交过程中运用智慧和策略,通过沟通、协调和妥协,达成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其传播与应用,促使各国更加重视外交手段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推动多边和平解决机制不断完善。联合国维和行动受此理念影响,通过非武力手段解决地区冲突,促进国际社会稳定与和谐。联合国维和部队凭借公正、中立立场,在冲突地区进行斡旋、调解和监督,为冲突各方提供对话和协商平台,防止冲突升级。通过这种方式,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解决地区冲突,还为各国间合作发展奠定基础,推动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

(三)经济与社会维度的价值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同样价值显著。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石。大规模战争往往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导致基础设施毁坏、经济衰退、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该理念强调避免大规模战争,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避免大规模战争可节省大量经济资源。战争是资源的巨大消耗器,武器装备生产、军队调动及战后重建等都需巨额资金投入。胡鞍钢(2019)认为若能避免这些资源在战争中消耗,便可将其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可改善交通和能源供应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科技创新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民生改善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合理投入节省的经济资源,可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形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这不仅能提高国家经济实力,还可提升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为国家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同时,“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可减少战争对社会结构的破坏,保障人民生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战争一旦爆发,社会结构常遭严重冲击,家庭破碎、人员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接踵而至。而该理念倡导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可最大程度避免这些问题。它保障人民生活稳定,使人们能在和平环境中工作、学习和生活。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各阶层团结与合作。同时,社会和谐稳定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可持续发展涵盖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政府和社会各界能更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制定并实施利于长远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动社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协调发展。

傅高义(2022)指出日本在战后依据和平宪法放弃军事扩张,这一决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生动实践。日本将资源集中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上,日本大力发展制造业和科技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在社会方面,日本注重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素质。这种发展模式使日本在战后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从战争废墟到经济强国的华丽转身,充分彰显“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巨大价值。

军事手段的非武力化为政治和外交手段运用创造有利条件。当军事手段不再局限于武力对抗,国家可更灵活地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例如,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寻求各方利益平衡点,实现和平解决争端目标。而政治和外

交上的和平成果又能进一步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利于国家吸引外资、开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同时,政治上的和谐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各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构成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价值。它为国家发展提供全面、可持续思路,即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需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手段,以和平、智慧方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四、结语

“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历经千年,在古今中外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从中国古代的思想萌芽到世界军事历史中的演变,从对其内涵的深度剖析到多维度战略价值的呈现,不难发现,这一理念始终围绕着追求和平、减少冲突、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核心目标。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冲突形式复杂多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为各国解决争端、维护和平提供了宝贵的智慧源泉。各国应深入理解并积极运用这一理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 [1] 张帆.论周礼对古代战争观念的影响[J].军事历史研究,2020,34(2):22-30.
- [2] 张立文.儒家“仁政”思想的当代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35(3):1-10.
-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123-135.
- [4] 孙中原.墨家逻辑研究的几个问题[J].哲学动态,2019(11):96-101.
-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何元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7]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8] 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M].徐昕,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9]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M].樊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 [10] 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M].钮先钟,译.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 [11] 胡鞍钢.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资源配置优化[M].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信出版社,2022.

[12]傅高义.日本的崛起与战后发展模式[M].北京:中

Deep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Tracing Origins, Analyzing Connotations, and Exploring Applications

WANG Rong-yu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1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using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o trace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alyze its connotations, and explore its strategic value and modern applications. Originating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is concept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The Art of War by Sun Tzu and has found echoes and undergone evolutions in world military history. Its core connotation lies in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non-war” and “subduing the enemy”: “non-war” emphasizes prioritizing non-military means with military force as a supplementary option, while “subduing the enemy” aims to crush the opponent’s fighting will and compel strategic adjustments. Strategically, it holds value in military affairs by reducing costs and enhancing initiative; in political diplomacy by aligning with contemporary trends, elevating national image, and promoting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omains by conserving resources, ensuring stability, and fost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concept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arrie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 words: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historical tracing; connotative analysis; strategic value